

文化符号视域下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祖力亚提·司马义¹ 刘庆斌²

(1. 新疆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2.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在全球化语境下, 民族国家不得不关注文化领域的非常规性、非制度性因素对民族共同体建构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影响。文化符号能创造出一种以共同性为基础的公共文化空间, 使不同族群既能按照自身心理上的接受程度进行自由对话, 又能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强化共同性来实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分析文化符号的特性和中华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的作用, 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路径, 能在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中防止出现强化差异的分离主义倾向和避免成为分离主义“无意识的共谋”, 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体国民的“无意识共识”。

关键词: 文化符号;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3) 04-0212-07

近代以来, “家天下”观念的逐渐解体和民族国家的出现, 推动了对中华民族存在与发展的自觉反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① 文化符号的创造体现了人对自然和人本性的超越, 因此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 不如说是由文化符号塑造的动物。卡西尔认为 “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 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② 文化符号不仅是人类世代创造的文明体系的内容表达, 更是能被感知的客观存在, 其背后包含着的精神力量, 不断地形塑人的心理和意识。文化符号具有的正向建构功能, 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主体性精神, 整个社会的理性精神也是在文化符号的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因此, 需要从文化符号的层面来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文化符号的特性

特性, 顾名思义指某种物体所特有的品质、性质。对于事物特性的总结往往建立在科学的归纳演绎和理性的理论实践基础之上。深刻理解事物的特性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文化符号是具有特殊性质的客观存在物, 通过对其民族性、场域性和表意多样性进行理论解读, 能够从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 (22VM200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 (21&ZMZ001)。

作者简介: 祖力亚提·司马义, 新疆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民族社会学; 刘庆斌,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专业方向: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①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第2版。

^②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人类文化哲学导引》, 甘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 第43页。

论层面阐释中华文化符号为什么能不断形塑中华民族整体的心理结构,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持续产出。

1. 文化符号的民族性

在卡西尔看来,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是三位一体的逻辑关系,因此他把人定义为符号化的动物,把世界定义为符号的世界,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①。符号通过与某些特定的意象相互关联,表现出其文化的本性。因此,符号就是文化的载体,一切可感的文化现象都是由符号来表达的。文化符号是指人类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创造的具有特殊意义和内涵的用来指称某一对象的标志与标志物,通过任何方式显示出任何意义的物品都可称之为文化符号。文化符号一方面通过具象的符号组合和抽象的符号结构与意义创造彰显着人类认识世界的逻辑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另一方面又通过其本身所具有的直观性和被感知性充当着个体与外界进行互动式意义交流的中介。文化符号背后是巨大的意义空间和想象空间,人在建构自身主体性和理性精神的过程中,需要以文化符号作为传承中介习得前人的经验智慧和借助文化符号与外界进行意义交流,并通过意义交流后的意义整合和意义再生产不断地形塑自身的思维结构和行为模式,最终实现作为唯一性社会个体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推动社会向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此外,被族群内部群体广泛认可的文化符号被意义化之后不仅能成为整个族群存在的客观基础,而且可以上升为族群的精神支柱。

一般来讲,不同民族因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而赋予象征符号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而导致某一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只能在民族内部被充分解读,比如某种文化行为(如特定的舞蹈形式、艺术表现、歌唱技法等)只能在民族内部引起情绪共鸣和群聚效应(趋同效应),因此民族性是文化符号的天然属性。“文化符号指那些只被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所承认,经常带有复杂意义的语言符号、图案和物体等。”^②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民族不仅是文化符号的创造主体,更是文化符号的传承主体,而且这种传承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过程,只有具有主体性精神的民族才能对文化符号进行具象的结构创造和抽象的意义创造,担任起这一历史的责任。因此文化符号总是依附于某一国家和民族,民族性是文化符号的预设属性。

2. 文化符号的场域性

“场域”一词来自于物理学中关于“场”的理论。在物理学术语中,“场”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具有某种性质的物体能对其他类似物体在不相接触的条件下施加影响。社会学家将物理学中关于“场”的理论移植到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用以研究个体或集体行为模式和行为动机的场域理论。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③在社会学研究中,场域理论是用来解释在限定范围内个体或集体的规律性或倾向性思维和行为的形成、发展、固化过程的一种理论。场域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并非单指物理空间上的限定性范围,更是指一种在社会中存在的现实的“无意识”的动力机制,这种机制能无意识地对场域中的个体和集体施加能量,深刻影响场域中个体或群体的思维、行为、表达逻辑和社会意识形成。

中国人认为文化拥有特殊的力量,能实现对人和社会的“教化”,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文化的教化力量实际上就是通过可感的文化符号为全社会提供关于是非、好坏、善恶、美丑等社会道德和价值标准,并通过这些标准来维持和引导社会秩序。进一步讲,文化的教化力量实际上是通过文化符号表征的多层级意义体系构成的符号场域来实现的。文化符号表征的

①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② 王丽雅《中国文化符号在海外传播现状初探》,《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5期。

③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核心价值体系是符号场域的客体构成要素，而进入场域的人是主体构成要素，通过客体要素对主体要素潜移默化的作用表现出文化符号的场域性。文化符号场域对主体的作用形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文化符号表征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直接影响场域中的受体，使其思维认知逻辑和行为方式趋于一致；二是通过影响整个场域中的社会舆论环境和空间环境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体。换言之，整个文化符号场域的结构是类似于蜘蛛网的互动型社会关系网，个体是这种关系网中的节点，节点与节点间的连接线是文化符号，因此文化符号场域可以看作具有独立性的社会个体按照既定的逻辑规则建构的整体性的联系机制，通过给予场域中个体既定的一整套标准来体现现实的力量，从而表现出其场域性。从现实层面来讲，文化符号场域对个体的影响深远，比如社会性个体一旦进入某种文化场域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语言文字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的编码模式，逐渐地适应这种由风俗习惯构成的多层意义体系，并将其中的一些以惯习的方式留存下来，通过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思想行为方式实现与社会的接轨和与他人的良性共存，这种“入乡随俗”的表现就是文化符号场域性的具象化体现。

3. 文化符号的表意多样性

人类从来都不单单是纯粹的物理存在，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存在，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借助文化符号创造出自身所需的“意义世界”，因此文化意义系统的传承与生命的传承同等重要。从文化符号的创造机制来看，人首先通过自己的直观感受对自然存在物进行复刻描写，创造出指向一定、表意单一的元文化符号，继而通过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将元文化符号进行重新组合编码，通过意义再造创造出具有多层意义指向的次一级文化符号，这就是文化符号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在历史的语境中，此过程完成了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和意义化。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级文化符号的表征意义都会进入下一级的意义体系中，比如人类对某些表征积极意义的文化符号进行意义再造时，往往只保留某一方面特定的意义指向，历史记忆中一些不活跃的因素或消极的含义会逐渐被边缘化。因此，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化符号，已经历不同时代的人根据其实际需要进行的形态结构的再造和意义的重新解读，并不断创造出新的意义附着其上，这导致了文化符号表意的多样性。

文化符号的表意多样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文化符号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表意是不同的，比如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对于相同的文化符号的解读不尽相同。中国人将自己视为“龙的传人”，认为龙是代表吉祥的瑞兽，而在西方的文化中，龙在多数情况下是邪恶的化身。二是同一文化符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意不同。文化符号在历史赋义的过程中，往往只有某种象征意义被保留下来并进行意义的丰富和再造，而其他的派生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被分解和遮蔽，封存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也是文化符号的内在发展规律。例如，“孔子”最初只是作为个人的称谓而代表其个人的存在，此时“孔子”可以视为元文化符号；随着时代的变迁，“孔子”在封建社会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代表；近代以来，“孔子”曾一度是封建、愚昧、落后的代表；而在当代，“孔子”成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文明精神和中华民族品性的代表，成为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从“孔子”一词的表意变迁来看，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于“孔子”的意义解读是不同的，人们根据现实需求将其消极的派生意义剔除并进行意义再造，使其符合时代的要求。从历史整体来看，文化符号的新表意来自于旧符号的“再符号化”或“再意义化”，异质文化符号的嵌入、驯服与再造，以及文化符号新的意义解读和意义扩容等。文化符号的表意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而产生了文化符号的表意多样性。

二、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

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①。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历史过程，可以看作中华文化符号不断形塑中华民族意识的过程。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既需要对文化符号的基本特性进行研究，同时又需要在理论层面廓清文化符号与民族意识、文化符号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实现对中华民族的理性认知和文化认同。

1. 文化符号与民族意识

安德森认为“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②，也就是说，民族的本质是一个“文化符号共同体”，民族形成的底层基础就是基于记录民族历史的文化符号形成的意义空间，文化符号构成了族内成员对民族的最初印象，缺乏统一文化符号的民族是虚假的共同体。微观来看民族的边界是流动的，但是宏观来看民族整体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由文化符号及其背后的意义体系建构的，而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没有一套逻辑严谨、关系紧密的文化符号系统，民族就无法抵挡外来文化的侵袭而失去本来的自我。文化符号通过形塑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展现其民族性。从构成要素来看，民族构成的首要条件是标志民族存在的物质基础，包括相当数量的个体、以群体为单位共同占有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民族的活动空间和由文化符号创造的文化空间。此外，标志民族存在的法理基础也是民族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所有记载民族来源的有形文化符号是确证民族存在的最可信理据，通过由文化符号记载的历史留存印象来回溯民族诞生的历史，是确定民族来源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根本措施和途径。民族成员通过回溯民族诞生发展的历史，能有效地加强其对于所属民族的认同意识。因此，文化符号不仅能使族内群体从心理上实现对自身民族身份合理性的判定，更能使族内群体在法理上实现对自身民族存在合法性的确认，有明确历史来源的民族更能激起族内群体维护民族利益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由文化符号表征的道德价值体系、民族精神体系或者宗教信仰体系是民族代际传承过程中的凝聚核心，是民族在历史的大潮中保持自我的关键。

民族意识的形成与文化符号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化符号对于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先在性的影响，通过其抽象的编码能力使民族的意识世界与客观世界实现联结。一般而言，社会性群体某种意识的产生十分依赖以文化符号作为意义中介的有效互动。费孝通先生认为“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③作为生发于民族这一文化意义上的整体的意识形态，民族意识是族内群体在与“他族”进行深度接触交往中产生的，是在对表征民族存在、民族历史的文化符号产生认同的基础上巩固的。也就是说，“本族”和“他族”如果没有在现实层面进行意义交流，就不会有“我一非我”这种群体性意识倾向，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就无从谈起，而文化符号则是这种意义交流的中介和工具。由于不同文化环境中诞生的文化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体系不同，所以在与“他族”接触交往中会对“本族”的文化符号产生认同，也会强化“我一非我”这种思维认知方式。此外，表征民族存在和共同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还能够引发族内群体的情绪共鸣和对族群的自豪感，并通过情绪的感染和传递使得族内其他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类似的情感，进一步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形成“同属一体”的心理意识。因此，民族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是在“对外”交往中形成的一个“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的集合体，并通过文化符号彰显的理性精神不断地平衡着族内这两种意识倾向的强弱。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民族内部的“自我意识”被过度强化，极易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深渊。

2. 文化符号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共同体是一种集文化、历史与心理结构于一体的非抽象性存在，其形成有独特的历史过程。事实上，民族共同体广泛存在于现代国家内部，比如我们常说的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等，就是典型

①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③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的民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基础是内部成员共享一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神话等文化符号系统,并通过具有主体精神的人在社会交往中不断地进行自觉建构。作为生发于共同体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弱是决定现代国家建构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一般来说,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越强,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意识和分离力量就越弱。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普遍地将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就是“国族”意识放在首要位置。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通过族内群体共同认可的文化符号培育来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文化符号还具有共情的作用,能将族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情感通过情感关系网络扩展到族内其他群体,进而广泛地引发族内群体对“他人”的集体好感,这种集体好感具有符合族内价值体系的解释功能。因此,文化符号是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

文化符号还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是集体生活的共享映象和集体记忆的表征与载体。哈布瓦赫将集体记忆定义为“社会群体共享的过程和结果”^①,而扬·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能对某种秩序和价值产生认同,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认为“‘集体记忆’在一个集体——特别是民族集体——回溯性的身份认同中起到了持久的作用”^②。通俗来讲,集体记忆是范围内具有文化同一性和内聚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往的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并非历史学意义上的对历史经历的明确记载,也不是群体内部个体记忆的集合体,而是一种相对模糊的整体性记忆呈现,这种记忆呈现能广泛地影响范围内群体的心理和意识倾向。因此,如果不同族群有共同的祖先或者祖先有共同生活的经历,虽然这种经历的具体细节可能不为所有人熟知,但是大部分人依然在内心深处留有祖先们共同生活的记忆。就像中国人一样,每个国人都属于不同的民族,但在潜意识中,我们都是华夏一族的后人,这种模糊的记忆呈现或记忆遗存就是不同族群共同记忆的现实呈现。拥有集体记忆的族群在心理上具有天然原始的“重叠共识”和亲近感,在情感维度更能彼此认同和相互接纳。因此,拥有集体记忆是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必要条件,文化符号能使基于集体记忆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无数深具特色与内涵的中华文化符号,几千年来积聚的文化精神也深深沉淀在中华文化符号所构成的意义空间中。以汉字为代表的工具型文化符号,以中华神话传说、中华英雄典故等为代表的象征性文化符号,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书画雕塑、传统习惯、节庆习俗为代表的表意型文化符号等,这些中华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中华文化符号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根基,特别是在儒家文化和汉字这种极具内涵和价值的文化符号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符号场域,使得中华各民族的思维和行为倾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形态下中华文化符号共同建构和培育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符号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成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即积淀在各族群众心理最深处的普遍性精神共识。在中华文化符号这种动力和意义系统的作用下,中华各民族必定向着共同性和一体性的方向发展。

中华文化符号对于各族群众回溯中华民族身份来历、产生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个体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总是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身份,如民族身份、国别身份、职业身份等,这些角色身份锚定了其社会中的位置。当个体进入某种角色身份当中,就需要表现出与角色身份相符合的言行,并根据其背后附着的权益、应尽的义务和他人对自己的社会期望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社会行为,形成某种身份意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因此,身份意识是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一种主动性表现,是社会意义上不断建构的过程,而且只有当身份与身份意识一致时,个体言行的真实性才能得到准确的“证明”。自觉的身份意识可以看作对身份的认同,是一种内在无意识的表

^①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②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 《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达。中华文化符号在中华民族身份的自觉意识形成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中华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体记忆,使“中华民族”成为各民族共有的集体身份,“‘中华民族’这一具有历史和文化意涵的称谓指向了内心意识中认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中国人’等文化身份属性的群体”^①。中华文化符号能使有意识的中华民族身份意识转变为内在的无意识的中华民族身份意识,能使中华各民族在历史叙事中不断彰显自觉的中华民族身份意识。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心理的形成关系密切。民族心理是指在文化影响下整个民族在心理上形成的包含稳定的意识倾向、思维认知结构、表达方式的一种图式。中华文化符号在历时与共时的时空交错中不断地形塑中华民族整体的心理定势,使得中华民族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依据。中华民族之所以不是“虚假的共同体”,是因为中华各民族拥有集体生活的历史记忆,在历史的演进中通过共享意义体系的文化符号不断形塑中华民族整体上的民族心理,中华民族“同属一体”的意识成为各族群众“心理上的事实”。文化符号对于民族心理的影响是超地域性的,一旦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结构在某种文化符号的意义体系影响下形成和固化,文化环境的改变对其思维和行为的影响就逐渐变得表面化了。比如中国人一看到“孝”的行为和代表“孝”的文化符号,就会在潜意识中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念相联系,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孝”的行为,这说明中华民族在心理层面已经建立起对于“孝道”稳定的心理定势,这就是中华文化符号形塑中华民族心理的过程。中华文化符号涵濡下形成的中华民族心理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根基性的价值和作用,能够唤醒中华各民族对于共同生活的集体记忆和建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回应性。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文化符号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兼具感性与理性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华文化符号的深度介入。在实践层面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路径,不但能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不断建构,以及对中华民族存在的理性自觉反思,而且能使各族群众对于中华民族的认知从“有意识”向“无意识”转变,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言的“无意识的意识”,即不需要外界刺激、自然而然地发自内心的“我——是中华民族”的意识。

1. 普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②通用的语言文字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内部“国族”建构的“先定性条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体国家意识和“国族”意识的形成,并且能创造一种公共的文化空间,使生活在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下的族群进行自由的交流和沟通。通用的语言文字也是产生情感认同的必要条件。人作为一种情感动物,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对于某个族群的美好情感能从心底激发其对该族群的认同,并通过其所处的情感关系网络将这种认同扩展到其他社会主体。

从具体举措层面来看,首先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社会氛围,通过物质奖励和情感激励充分调动各族人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热情。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和基层党组织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广中的关键作用,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宣传教育中去;其次是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制定普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家规划和建立长效保障机制,为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供专门的资金、技术、人才、政策支持,严厉打击各种损

^① 冯月季、石刚 《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思想战线》2021年第5期。

^②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广的言行；最后是重点筑牢基础教育主阵地，通过“青少年筑基工程”“优秀基础教育师资培育工程”等措施在全学段内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推广工作，以此为基础持续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作。

2. 保证中华文化符号的空间在场性

空间在场是与空间缺位相对应的概念，指社会主体在日常生活空间中对于表征民族形象、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的感受度，个体在日常的生活空间中能否时刻感受到文化符号的存在是衡量其空间在场性的标准。文化符号强的空间在场性能深度地影响整个族群的心理结构，形成群体性的稳固心理定势，进而使某种社会意识得以持续不断地产出。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时刻保证中华文化符号的空间在场性，打造代表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历史的公共文化空间，使各族群众在耳濡目染中实现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具体来看，首先要保证中华文化符号在社会空间中的在场性，将有显示度的标语、宣传画、横幅、装饰品等与中华文化符号深度融合，打造充满中华文化符号的社会空间；其次是保证中华文化符号在心理空间中的在场性。具象化、可视化、可爱化的文化符号更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因此，要探索发掘中华文化符号的创新性传播形式，通过对古老的中华文化符号进行现代化设计，使其符合当代人的心理接受规律；最后是保证中华文化符号在网络空间中的在场性。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符号的传播形式，使其影响广度和深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在全球化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整合民族文化符号、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因此，借助互联网打造一批能广泛引起各族群众阅读兴趣的文化产品，对于增强中华文化符号的空间在场性和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展现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十分重要。

3. 确保中华文化符号意义教育的深刻性

中华文化符号背后是十分宏大的历史叙事背景和意义体系，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和各族群众共同奋斗的历史经历，能广泛地引起中华儿女同属一体的情绪共鸣。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各种所谓的流行文化对中华文化符号背后的价值体系造成了冲击，使中华文化的原型内核极易遭受表面化的意义解读，比如网络上对某些英雄人物进行娱乐化解读，致使部分人对中华文化符号的意义认知不够深刻。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中华文化符号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出现过度娱乐化和商品化的倾向，加之宣传模式的同质性和生硬性，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核极易被稀释甚至遮蔽。

因此，要克服中华文化符号教育过程中的表面化现象，确保其意义教育的深刻性。首先要系统地阐释中华文化符号的形成发展脉络，特别是表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符号，比如昭君出塞、土尔扈特万里东归、文成公主入藏等，通过历史史实深度还原这些能广泛引发各族群众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引导各族群众建立中华民族一体的意识；其次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教育，比如参观红色文化纪念馆、革命遗址、历史博物馆等，使各族群众直观地感受中华文化符号的现实存在和博大精深的价值内涵；最后是创新中华文化符号意义教育的方式和载体，通过互联网、短视频、微博、微信等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使中华文化符号蕴含的精神特质深刻影响各族群众。

中华民族是文化的民族，博大精深、意涵丰富的中华文化符号构成了各族儿女对中华民族的最生动、最原始的“想象”，为中华民族描绘了斑斓的底色。中华文化符号背后巨大的意义空间以及由意义空间具象化所产生的中华民族一体意识主导着整个民族的理性化发展方向和文明意义化再造，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以更加积极的主动精神发挥中华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作用，通过中华文化符号背后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积淀下来的一整套意义系统，不断激活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理性认知和参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动性。

责任编辑：王永平